

·台港研究·

香港历史的地名透视*

夏敏

(南京大学学生工作处, 南京 210093)

摘要:地名是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利用地名资料,既能够概略地透视开埠以前香港历史的诸多方面,又可以更加切实地认识开埠以后香港文化的复杂形态。

关键词:香港历史;地名资料;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K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1)04-0122-06

什么是地名?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1](P89)}地名是人们命名的、公认的,反过来,地名又成为人类社会各种信息的载体,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地名是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前苏联地名学家A·M·谢利谢夫认为:“地名是了解历史人文学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史最珍贵的资料之一。它可以阐明很久以前各人种的关系史,各族人民和各居民群的迁徙情况,经济和社会关系。”^{[2](P71)}B·A·茹奇凯维奇指出:“地理名称非常稳定,保持久远,成了独特的历史文献”,进之,“地名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可与物质文明的遗迹的作用相比拟”,因为“地名资料是一种具有本源意义的文献”。^{[2](P3)}日本地名学家山口惠一郎在回答“地名能告诉我们些什么”时说:“首先,什么样的地形起什么样的名字,也就是说,地名的内容能够反映地貌。其次,说明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居住生活,地名中能反映出进行农耕、开辟道路、建立市场、发展经济等等这些事。第三,反映了在人们具体生活的地区所产生的信仰、风俗、习惯等。第四,反映从行政上的需要所产生的官职、土地制度等等法制上的东西。以上这些极其珍贵的东西都可以从地名的来历中找到它的踪迹。”^{[3](P303)}

具体到香港的历史,自然也不例外。香港历史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惟值得指出的是,地名资料的价值,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重视。事实上,借助于地名资料,不但可以适当弥补香港开埠前文献资料的缺乏,概略地透视出其历史的诸多方面,而且可以更好地认识开埠后香港文化形态的复杂性。以下即由此种思路出发,作一方法的尝试。

一、元明以前香港历史的地名透视

先秦时代,现香港地区原住民为越人。秦始皇统一中原后,征服岭南,现香港地区从

* 收稿日期:2001-03-02

作者简介:夏敏(1975-),女,江苏苏州人,南京大学学生工作处助教。

此纳入了中原王朝或割据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大致说来,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至东晋咸和六年(331年),现香港地区隶属番禺县;咸和六年至唐至德二载(757年),改属宝安县;757年宝安县改为东莞县,香港于是又属东莞县;明万历年年(1573年)新设新安县,由此直至被英国割占、租借前,今香港地区一直隶属新安县管辖。

在此期间,香港地区的地名由简到繁,由少到多,并由此反映出历代的民众南迁和该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秦时发戍卒50万至岭南,与越族等非汉民族杂居,此后,今香港地区的汉人比例不断增加。唐时,由于香港位居入粤孔道,海外商旅到广州必经香港屯门,所以开元年间中央政府设置屯门军镇,兵额两千,辖香港至大鹏湾等处,至今香港仍留有“屯门”以及“屯门政务区”地名。五代南汉时,由于香港地区盛产珍珠,政府在大埔海一带(今吐露港)设媚川都,督管采珠业,并招募广东等地专户采珠。宋初,因香港地区盛产海盐,于是设置官富场,派官员专门负责煮盐事务,有寨兵屯卫,该场盛时为广南东路所属13大盐场之一,今香港九龙西北还留有“官富山”一名。

汉人的较大规模入迁,自宋朝开始。当时,香港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中原居民南迁渐多,他们大多聚居在沿海地域和内陆谷地。据现存新界各姓族谱,宋元期间入住香港新界的有八大姓:邓、彭、林、廖、陶、侯、吴、文,他们定居在屯门、衙前围等沿海地域及锦田、大埔、龙跃头、粉岭、屏山、上水等内陆谷地。土著民除与这些移民杂处外,有的退居山中,务农为业,也有的泛居海上及沿海岛屿,以捕鱼为生。^{[4](199)}北宋崇宁间,江西吉水人邓符协中进士,授阳春(今广东阳春市)县令,卸职后“卜居邑之锦田桂角山下,创立瀛书斋,以招徕学者。……子孙世居锦田、龙跃头、屏山、竹村、厦村等处,至今推为望族。”^[5]这些内地移民的迁入,促进了香港地区的经济繁荣与文化发展,地名也随之越来越多。

到了明代,除珠、盐外,香港地区也产香树,称莞香,多运销内地,有的地区还盛产茶,经济较前代又有所发展。同时内地频繁的战乱又使南迁移民继续增加,聚落也增加了不少。明万历年,香港地区的人口密度已大致相当于广东全省的平均水平,即每平方公里约10-11人,著籍户数约2200户,人口约1万。^[6]仅香港岛上就有聚落七个^[7]:香港(今香港仔黄竹坑)、铁坑(今香港仔黄竹坑与深水湾间一海滩)、春磴(今称春坎,位于香港岛浅水湾和赤柱间)、赤柱(今仍保留原名)、大潭(今位于赤柱巴士总站旁,仍为旧名)、稍箕湾(今称筲箕湾)及黄泥涌(今称跑马地)。各聚落所在地,都在港岛的南部,可见当时香港岛北部人口仍然十分稀少。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广东吴总督、汪御史会题:“南头为全广门户,控制蛮倭,请以总兵移镇。盖香船可直达澳门,而由澳门至省则水浅不能行,必须由大屿山经南头直入虎门以抵珠江,此南头所以为全广门户也。”明朝末年,政府在沿海地带新设南头寨,辖汛地六处:佛堂门、龙船头、洛格、大澳、浪淘湾、浪白,并以海军舰巡防各汛地,以卫居民。^[8]而时至今日,“南头”之名仍存。

二、清前期香港历史的地名透视

清顺治与康熙初年间,朝廷为防止沿海居民对明朝遗臣郑成功的接济,实行迁海,三年之内,连续颁布了三道迁海令,规定山东至广东沿海的居民,全部内迁30至50里,房屋全部焚毁,土地全部废弃,沿海居民船只不许下海。迁海后,三面环海的新安县人口急剧减少,康熙五年竟被撤县并地(归入东莞县),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整个在迁徙

之列,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康熙八年(1669年),由于湖广、福建、两广等大臣疏陈迁海之弊并倡议展界,清廷将边界稍展;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五月,台湾郑氏归降,当年十月,各省得以展界。原香港的居民在康熙八年展界后陆续迁回,离岛地区居民则在康熙二十二年后才得以迁回。为加速发展沿海经济,雍、乾期间,清廷下诏奖励客族入迁定居。这次移民潮持续时间较长,从康熙中期开始,经雍正朝和乾隆朝,直到嘉庆末年仍没有停止。由于居民的回迁和移入,香港岛上的香港、铁坑、春磴、赤柱、大潭、稍箕湾及黄泥涌七村相继复建。

新界的居民重回旧地,复建家园,因沿海驻守的实力不足以平寇安民,为求自保,在新建村庄四周建高围墙,挖深护河,安铁闸门,以保生命财产,这就是新界所见之“围村”。而与此同时入迁的客族居民,定居新界及离岛地区,垦辟荒田。这些客籍民有一姓或数姓合力开村立业,由于主客矛盾和提防寇患,客籍民多将住屋连接成排,形如围墙,村以多排横屋组成,因此被称为“围屋”。清中叶以后,寇患渐平,治安日趋安定,为防寇患而建围村、围屋者渐少,当时所建的全族聚居的围村,实际上已成为该族的经济象征了。

据记载,康熙年间新界的围村有19个,分别是:鉴巷围、壘头围、沙莆围、高莆围、田寮围、郁子围、长莆围、石冈围、竹园围、水蕉围、山下围、水边围、屏山围、香园围、荫下围、厦村围、辋中围、子屯围、新村围。^[9]到了嘉庆年间,新界的围村增至29个,分别为:元朗的英龙围、南边围、西边围、竹园围、青砖围、水边围,屏山的香园围、新丰围、子屯围,锦田的高莆围、石冈围、合山围、东安围、沙莆围、田心围,新田的壘头围、福兴围,上水的木湖围、莆上围,另厦村锡降围、梅窝袁家围、粉岭丙岗围、沙田积存围、蕉径陈屋围、连麻坑洞头围、船湾田心围、沙头角南涌围、大埔大埔围、大屿山东涌岭皮围。^[10]

嘉庆年间,在香港地区称霸一时的名海盗张保仔在港岛留下了扯旗山、西营盘等地名。扯旗山,古称香炉峰,今又名太平山,是港岛的最高峰。嘉庆十一至十五年(1806—1810年)间,张保仔占据香港岛作为地盘,在太平山下设东西营盘,并利用最高峰作瞭望台,看到海上有商船经过,就用旗号通知山下营寨,出动船只截劫,“扯旗山”的名字因此而来。“营盘”在港岛的口语中是屯驻武装人员的营寨,现虽已无人能指出当时的营寨曾设在何处,但“西营盘”这个地名却保留沿用至今。当时与西营盘相对的东营盘,设在北角与笏箕湾之间的七姊妹道附近,遗迹今已不能考,地名也未留下来。

“石塘咀”地名的由来,同移民入迁也不无关系。当时移民中有些采石的工匠,他们听说香港岛上有不少可采掘的石山,便邀集同业乡里,取道沙头角入九龙官富场,渡海到港岛。他们选中了岛西一带地近海边便于运输,同时用途多又易凿采的花岗岩石山,合力采石为生,很快就把那里开成一个下陷的大石塘。石塘向海一端较为窄而尖,从高处看有如鸟嘴,被称为“石塘咀”。石匠们在此建村用来安顿亲属定居,小村就取名石塘咀村。后来该地虽历经变迁,但“石塘咀”的名称还保留至今。

嘉庆年间,今香港地区的人口已达14万,属官富司辖区内的村落也随之增加。该司管属村落三百余个,客籍村落近二百个。^[10]这些村落的命名受到当时自然环境、社会因素、聚落景观以及物产、植被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其名称不仅反映了当时该地的地理环境特征,同时也反映了一些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情形。略举几例如下:

(1)以方位词命名村落名。如东头村、西山村、元荫南边围、元荫西边围、南岸村、上梅

林、下梅林、东涌村、西涌村、田尾村、松源头村等。这些命名中出现的方位词极少有以中原地区常见的阴或阳来定位的，一般以东南西北中、上下、左右及头（东北方向）尾（西南方向）等来定位，这可能与香港地区的河流多非东西流向有关。

(2)以物产、矿产及植被命名村落名。如水贝村、黄贝村、田贝村（出产名“贝”的建筑材料）、白坭坑（有白陶土）、竹园村、松柏荫、榕树澳、草塘围、木棉湾、黄鱼滩、铁场（有铁矿石）等。

(3)沿用古语地名。如榄口村，“榄”是古壮语，即“凼”，也作“霖”，指水，即水道口的村落；再如古洞村，“古”字壮音即“箇”字，是“这个”或“那个”的意思，为指示代词，“洞”有山间小盆地之意，即这个山间小盆地的村落。

三、英属后香港历史的地名透视

中英鸦片战争中，香港岛为英国占据，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订立江宁条约，香港岛割让于英国；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中英订天津续约，又以香港对岸之九龙司地方一区割归英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英订香港界址专条，次年，勘定以深圳河及深圳、大鹏二湾以南及附近海面租于英国，以九十九年为期限，而为别于割让地九龙司地方一区，此称九龙新界。至此，今香港地区全部归属英国统治。

根据1841年5月15日《香港公报》（Hong Kong Gazette）第2期的记载，当时香港岛上有聚落16处，另有4处已荒废，人口7450人。按人口算，最大的两个聚落为赤柱和筲箕湾，人口分别为2000人和1200人，其他聚落5人至300人不等，分别为：香港（村）、黄泥涌、亚公岩、石澳、大石下、裙带路、扫管莆、红香炉、柴湾、大浪、土地湾、大潭、所罟湾及石塘咀，另外无人居住已经荒废的4处为：春坎、浅水湾、深水湾、石排。

英人占领香港岛之初，本以赤柱为大营，后因该处气候恶劣、瘴疫蔓延，于是发展港岛北岸，移山填海建立维多利亚城（亦称女皇城），之后继续向岛东、岛西两面和太平山上发展，并进行各种市政建设，增建道路，修筑堤坝。这期间，台山、鹤山、赤溪等地的械斗，太平军起义于金田所带来的动荡，使广东等地的居民举家南迁至港岛躲避混乱；外加港岛的全面市政建设给外来移民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包括各行业的手工业者、工匠、商人等纷纷迁入香港寻求发展。香港岛居民数，到了1853年增至近4万。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应地带来了香港地区地名的发展。1866年5月出版的由意大利传教士所绘的广东新安县图中所记香港地区^{[4]（P28）}（包括香港岛、离岛、九龙半岛、九龙新区和新界）的地名已达387个。地名新增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原住民人数增加后，另建新的聚落；第二，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居民因种种原因南迁入港，开辟建立新的村屋；第三，英人入港后，修筑道路、屋宇、命名地块等导致地名增多。此后的香港已不再是“中国海防上的一个小点”，其构成也不再是由一个个分散的单一聚落组成，而是开始步入了城市化的道路，并逐步成为了国际化大都市。地名的定型与随之出现的制图、邮局、电报、铁路等密切相关，英政府也开始通过专门的法令和命令来确定地名。时至香港回归前，香港地区的地名已逐步趋向系统化、完备化和科学化。

整个香港地区划分为19个政务区，其中香港岛4个区，包括中西区、湾仔区、东区 and 南区；九龙（新九龙在内）6个区，包括油尖区、旺角区、九龙城区、观塘区、深水埗区、黄大

仙区;新界本土8个区,包括荃湾区、沙田区、葵青区、屯门区、元朗区、大埔区、北区、西贡区;离岛自成一区,为离岛区。

香港地区未开埠前没有正式的路、街名称,自英人筑第一条道路即皇后大道以后,随着城市规划、建设的展开,香港地区的道路、街巷也逐渐密集起来,尤其在港岛北部和九龙半岛等人口稠密地区更是如此。

新界地广人稀,主要集中全香港的农业和工业用地,虽有荃湾、沙田等市镇的后来兴起,但总体上仍非人口集中的闹市区。位于新界的主要道路只有十多条,如沙头角公路、青山公路、锦田公路、粉岭公路、大埔公路、吐露港公路、屯门公路、西贡公路等。

九龙和港岛面积虽远不及新界,但由于开埠较早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人口稠密,商业繁华,道路、街巷较多。其主干道的命名,有以下几种方式:

(1)人名音译后作为专名。如弥敦道、德辅道、般咸道、坚尼地道、轩尼诗道、漆咸道、加士居道、左敦道、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卑路乍街、干诺道、告士打道、坚道、遮打道、薄利臣山道等。这些以人名命名的道路在香港有很多,特别是在港岛,其中有香港总督、政界军界要员,还有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名流等。

(2)用于表明领土占领、带有殖民色彩的专名。如九龙地区的太子道、公主道等,港岛的皇后大道、英皇道等;再如九龙的歌和老道,原是英国一郡名(Cornwall),香港地区最初发展时曾规定街区名要以英国地名命名。

(3)沿用原有聚落名为专名。如观塘道、鲤鱼门道、青山道、荔枝角道、薄扶林道、黄竹坑道、筲箕湾道、柴湾道等。

(4)以中国传统的表达美好愿望的祈愿词为专名。如龙翔道、彩虹道、康庄道、启祥道、启福道等。

至于香港地区一些街巷地名的命名,则带有较强的写实性,如西洋菜街曾是西洋菜田,洗衣街上有过洗衣局,银幕街附近曾有过香港最早的电影制片场,摩罗街曾经广布印度人,分别在港岛和九龙的花园道和花园街都有过花园,界限街的确曾起过界限的作用。另有一些街巷,虽然英政府给其取了一个书面的官方名称,但港人仍从实用出发,写实的口头名应用更为广泛。如厚成街称食街,文咸街称南北行街,乍畏街称苏杭街,永胜街称鸭蛋街,永安街称花布街或大姑街,阁麟街称雀仔街,文华里称图章街等。

在香港地名中,还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双语地名的存在。百余年来英国在香港地区强制推广英语,使英语成为官方的语言文字之一,同时,华人占绝大多数的香港有着根深蒂固的汉语传统,于是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形成了香港地区独特的“中英并用”的双语制度。如香港仔(Aberdeen)、大屿山(Lantau Island)、青山湾(Castle Peak Bay)、大鵬湾(Mir's Bay)、后海湾(Deep Bay)、赤柱(Stanley)等。

综上,仅就地名立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认识:其一,香港开埠前地名的稀少,可以表示该地区当时人口的稀疏、政治地位的不重要;香港开埠后地名数量的激增以及地名种类的丰富,则可以表示该地区人口的增多、移民的迁入、城市的发展等方面;其二,香港地名地理分布上的不均匀,可以表示那里各地块土地利用形式的不同以及经济开发程度的深浅;其三,香港地名难懂、难记,以及双语地名的存在,可以表示那里的方言特征以及

华洋文化复杂的交融。而如此种种,无疑拓宽了对香港区域研究的综合空间及史料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引证的香港地名资料,数量有限,种类不多,且仅就地名专名及其取义稍作展开。其实重视并运用地名资料,于地名通名也不应忽视。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专名用来区别地理实体中的不同个体,相当于人的姓名中的名;通名指出地理实体的类型,相当于姓名中的姓。香港地名的专名,表现着历史,记录着经济开发的历程,呈现着香港区域的自然面貌、人文景观及其变迁;然则香港地名的通名,同样反映了香港自然与人文的诸多方面。譬如清嘉庆年间香港聚落地名的通名,若围、排、荫、莆、壘、濠、海等,皆具地方特色。“围”前文已有所涉及,“荫”本指较低较平的可耕地,“壘”意为堤围,“濠”的通俗义为水沟,又香港当地人或称“河”为“海”,“莆海村”之“海”即意为河。至于英属后香港道路通名多用“道”、“公路”,则已具外来特征。

要之,研究香港的历史与文化,古往今来的香港地名是值得重视的一类独特资料。通过对香港地名专名的渊源解释及通名的审义辨类,我们可以获得有关香港的许多新知识。

参考文献:

- [1]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Z].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 [2]B·A·茹奇凯维奇.普通地名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
- [3]胡阿祥.地名学概论[M].南京:南京大学(印行),1991.
- [4]萧国健.香港历史与社会[M].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出版社,1994.
- [5]王崇熙.新安县志:第21卷[Z].1819.
- [6]胡阿祥.5000年来香港人口的变迁[J].南京史志,1997,(1).
- [7]郭棐.粤大记:第32卷[M].明万历年刻本.
- [8]王崇熙.新安县志:第12卷[Z].1819.
- [9]邓文蔚.新安县志:第3卷[Z].1688.
- [10]王崇熙.新安县志:第2卷[Z].1819.

A Study of Hong Kong History by Its Geographical Names

XIA Min

(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Geographical nam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tudying history. The examina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name data in Hong Kong presents not only a brief account of various aspects of its history before Hong Kong became a British colony but also a better insight to the complex culture in Hong Kong after its colonization.

Key words: Hong Kong history; geographical name data; research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 朱剑)